

# 混合式選制下的投票思維： 台灣與日本國會選舉變革經驗的比較<sup>\*</sup>

王鼎銘<sup>\*\*</sup>、郭銘峰<sup>\*\*\*</sup>

## 《本文摘要》

適來以融合「單一選區多數決制」與「比例代表制」兩種選制精神的「混合式選制」(Mixed or Hybrid Systems)，深受各界的重視。相關的研究除針對混合選制的內涵進行概念性界定與歸類，另外亦聚焦於該選制與多元社會的發展關連、與選民策略性分裂投票行為的連結、對既有選舉文化及政黨競爭策略的互動、甚或對政黨體系形塑的影響等。本文則是透過「日本選舉研究」(JES)與「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所彙整的個體層次民調資料，比較台日兩國分別從「單記非讓渡投票制」變革為「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後，選民投票思維乃至政黨體系發展等的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兩國選民在初次實踐新選制時的投票決策，甚或縱跨選制變革前後的動態投票轉移趨向，確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別。從選民一致分裂投票行為模式的橫斷面分析而言，新選制實行後主要政黨雖均獲兩票高度的一致支持，但台灣不僅國民及民進黨兩主要大黨獲得的一致支持率較日本為高，並且對於兩黨體制的形塑目標是較日本來得明確。再就投票動態轉移的跨時序分析來說，本文也發現選制變革後確實有利於大黨選票的聚集，且新選制後台灣選票聚集於主要大黨的比例，比日本情況更為明顯。總括本文的分析結果，除了印證台灣在改採新選制後，有效政黨數較日本狀況更趨近於兩黨競爭的格局，另外實踐新制對小黨生存空間造成的壓縮效果，在台灣是比日本來得更為負面。

關鍵詞：混合式選制、日本眾議員選舉、台灣立法委員選舉、一致與分裂投票、投票穩定與變遷

<sup>\*</sup> 本文初稿發表於「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TEDS2008L)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2009年1月18日。作者誠摯感謝會中林繼文教授、黃紀教授等先進的寶貴意見，以及期刊兩位匿名評審委員的精闢修改見地，使本文修繕後更具可讀性。當然，文中若有任何舛陋疏忽之處，概由作者負全責。

<sup>\*\*</sup>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E-mail: dmwang@ntu.edu.tw。

<sup>\*\*\*</sup>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E-mail: mingfeng.kuo@gmail.com。

## 壹、前言

對位居東亞關鍵位置，並同為該區民主發展典範的台灣與日本而言，由於相似的政經發展脈絡，因此經常被學界視為比較政治研究中絕佳的比較案例（Cox 1997; 林繼文 2008）。除了近似的經濟發展模式外，政治層面上兩國均是由一黨獨大的政體開始演變，台灣的國民黨與日本的自民黨可說長期主導了兩國政治與社會的發展。不過，兩國卻也同時在九〇年代初開始面臨民主的轉型及政黨生態丕變的考驗，從這一時期以來國民黨與自民黨勢力的興衰消長，便可清楚觀察兩國政局劇烈變動的情形。而在兩國民主轉型過程中，面臨政治體系運作效能上極為類似的一些挑戰，例如極端主義、少數當選、小黨林立、派系政治、買票賄選、政權不易輪替、議事效率低落等問題，均引發兩國民眾對於既有政治體系之課責性 (accountability)、運作效能 (efficacy)、與正當合法性 (legitimacy) 的強烈不滿與批判（Cox and Rosenbluth 1993; 佐藤誠三郎 1997; 王業立 2008; 王鼎銘、郭銘峰與黃紀 2008）。社會各界更普遍認為，肇使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兩國長期所採用「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SNTV) 的選制結構恐難辭其咎（Cox and Thies 1998; Sakamoto 1999; 吳重禮 2008）。

也因如此，日本跟台灣不約而同開始推動體制上的選制改革工程，先後於 1994 年及 2005 年通過國會議員選舉制度的變更，並同以混合制的「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 MMM) 取代舊有的 SNTV。進一步來說，日本政治及選制改革的時間發生較早，且源自八〇年代末自民黨政治人物涉及政治弊案所激起的一股政治改革風潮（楊鈞池 2001）。到了 1993 年眾議院改選前夕，自民黨產生了嚴重的派系分裂，先驅新黨、日本新生黨等先後從自民黨分裂出來，最後導致自民黨在 1993 年選舉無法取得過半數席次，被日本新黨細川護熙領銜的八黨派聯合政權所取代。值此維繫 38 年之久一黨獨大的「五五體制」崩解之際，日本政治改革反而綻露出曙光。1994 年 1 月參眾兩院通過「公職選舉法修正案」、「政治資金限制法修正法案」、「政黨助成法案」及「眾議院議員選舉區劃分審議會設置法案」等四項政治改革法案，選舉制度也正式由「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sup>1</sup> 取代原本中選區之「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並自 1996 年 10 月的眾議員選舉正式實施。<sup>2</sup> 至於台灣部分，雖然自 1980 年代末社會各界已開始物議 SNTV 的諸多弊

<sup>1</sup> 對於日本在 1994 年所通過並立式之單一選區兩票制，在日本當地習慣的用語係稱之為「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大竹邦實 1996; 宮川隆義 1996; 林繼文 2008）。不過為與台灣情形對照說明之便，本文統一以「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稱之。

<sup>2</sup> 有關日本與台灣歷年來的選制演進與新選制的變革過程，許多文獻已有更詳盡的歸納整理，如日本部分可參見大竹邦實（1996），河野武司（2007），王鼎銘、郭銘峰與黃紀（2008）；台灣部分則可參見王業立（2008），篇幅所限本文不過多贅述。

病（王業立 1989；牛銘實與王業立 1990；林繼文 1999），但實際啓動選制改革的號角，是源自於 2004 年 8 月立法院提出的第七次憲法修正案。特別在 2005 年 6 月三百位任務型國大代表複決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究其要者包括四項主要的修正案：一、國民大會機構的廢除，未來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經立法院提出，改由公民進行直接複決；二、正、副總統彈劾案經立法院提案決議後，改交由司法院大法官憲法法庭審理；三、立委席次自第 7 屆起減半為 113 席，區域立委佔 73 席、平地及山地原住民各 3 人、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有 34 席，任期也由三年改為四年；四、立委選制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區域及原住民選區依各地人口比例分配，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出之，不分區及僑選依政黨名單投票，由獲 5% 以上政黨選票之政黨按得票率分配。

總括來說，台日兩國改採新選制的目標，莫不是希望能導正 SNTV 選制下的諸多弊病，也就是將以往著重於地方特殊利益、恩庇侍從 (patron-client) 社會網絡關係維繫，強調以「候選人為中心」(candidate-centered) 的競選過程，轉化為著重於政黨或政策為本位的選舉競爭取向。也就是說，兩國期望藉由新選制的實踐，以強化政黨在選舉競爭與政治運作過程的責任，並且最終促使國家政黨體制形塑至兩黨良性競爭格局的目標邁進（小林良彰 1994；村松岐夫、伊藤光利與辻中豐 2001；王業立 2008；吳重禮 2008）。

台日兩國如此類似的政治改革背景，不僅豐富了東亞區域研究的內容，更提供我們比較兩國民主發展過程的重要基礎。針對兩國選制的相關研究，現有文獻曾分別從選制起源、演進與類型等進行探討（如王業立 2008；林繼文 1997；蔡學儀 2003）、或關注選區劃分與政黨分配門檻等選制執行面的相關課題（游清鑫 1994；1996；張世賢 1995）、亦或探析選舉制度對於政黨提名策略與選民投票抉擇等的可能政治效應（王業立與彭怡菲 2004；盛治仁 2006）。但總括來說，相關文獻由於囿限於既有資料，因此難免偏重於制度規範面或總體選舉資料的解讀，實際根據個體民調資料，跨國解析並比較台日兩國新選制下選民投票行為差異的研究，目前仍絕無僅有。本文在此條件之下，不僅試圖彙整兩國新選制細部規範的異同，並輔以兩國學術民調資料，「日本選舉研究」(Japanese Election Study, JES) 與「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從事跨國性選舉制度效應的比較與實證分析。進一步來說，我們將先運用橫斷面 (cross-sectional) 的民調訊息，比較兩國選民在並立式兩票結構下的一致分裂投票行為；第二步驟則是使用跨時序 (longitudinal) 的定群追蹤資料 (panel data)，剖析選民縱跨選制變革前後的動態穩定與變遷投票軌跡。藉由這兩個不同面向的投票行為剖析，本文得以比較兩國初次實踐新選制後，政黨體系對應選制變遷發展趨向的差異。

前言之後，依序安排本文章節架構如下：第二節首先介紹混合式選制的內涵，並歸納

比較台日所採用制度架構的異同；第三節則是回顧台日兩國首次實踐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後的選舉結果，以瞭解台日兩國選制變革前後國家政黨體系的變化；第四節是介紹學界對於混合選制下，兩票架構可能具有相互影響的感染效果的論述，依據這些觀點，第五節便接續針對台日選民在這種選票架構下的一致分裂投票進行實際分析；第六節則是針對選制變革過程中，選民動態投票轉移行為的相關理論進行探討；第七節進一步利用兩國的定群追蹤資料，探析選民在選制變革前後投票行為的動態轉移情形，藉此比較兩國主要政黨在新選制下的選票狀況，並觀察政黨體系對此一變革的回應；最後第八節是本文的結語。

## 貳、混合選制與台日設計的比較

融合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精神的混合式選舉制度 (Mixed Electoral Systems)，邇來備受各界重視與矚目。學界關注的焦點，包括有對混合選制的內涵深入進行概念上的界定或歸類 (Massicote and Blais 1999; 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政黨在混合選制下參選策略的分析 (Ferrara and Herron 2005)、選民在兩票選制誘因結構下所展現的不同投票決策思維 (Gschwend, Jonston, and Pattie 2003)，此外，相關文獻也深入剖析混合選制在世界不同國家實施的改革經驗。目前相關研究探索的對象，有採聯立式的德國 (Gshwend 2007; Lancaster and Patterson 1990; Schoen 1999)、義大利 (Donovan 1995; Katz 1996)、紐西蘭 (Karp et al. 2002; Vowles 1995)，或是並立式的日本 (Kohno 1997; Reed 1999; 2007; 黃紀、王鼎銘與郭銘峰 2008)，俄羅斯 (Moser 2001; Thames 2001) 等國。甚或有部分研究，是針對改革混合式選制經驗後，進行跨國的比較分析 (Cox and Schoppa 2002; Gallagher 1998)。

根據 Rae(1971)、Lijphart(1984; 1994)、王業立 (2008) 等選制專家的看法，不同國家的選制結構，終會導致不同的政治效果，是以當中的選舉規則 (electoral formulas)、選票結構 (ballot structures)、選區規模 (district magnitudes)、選舉門檻 (electoral thresholds) 等，均是須仔細觀察比較的重要指標 (Lijphart 1984, 7-8)。至於有關混合選制的相關研究，最主要便是根據混合選制的設計變異來做比較。進一步來說，不論是採聯立式或並立式的混合選制，共同特徵便是強調國會代議士的遴選，是藉由兩種選票結構（一票選人、一票選黨）來產生；另外，聯立式或並立式兩者間最大的差異，便是以單一選區 (Plurality with Single-Member-District System, SMD) 與比例代表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 席次間的連結關係 (seat linkage) 來進行歸類 (Ferrara and Herron 2005; 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並立式的混合選制是強調兩種議席是獨自分開計算，而聯立式則是強調兩種議席具備密切關連性。雖然相關的研究成果豐碩，但針對混合選制下兩種選票的牽引連動效

果，在學界仍引發相當廣泛的爭辯：其中一派認為混合選制的兩票抉擇是各自獨立、互不影響；另一派則主張兩票抉擇則是相互影響，具有「連動效果」(interaction effect)或是所謂的「感染效果」(contamination effect) (Ferrara and Herron 2005; Herron and Nishikawa 2001; Huang, Chen, and Chou 2008; 林繼文 2008; 陳陸輝與周應龍 2008)。

至於台日兩國雖均採並立式的混合選制架構，但細究兩國選制的內部設計，仍不難發現一些差異（請參見表 1）。其一，兩者間議會席次差距甚大。台灣在 2005 年修憲的結果除修改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外，更大幅縮減原有 225 席的議會規模至 113 席，也就是熟知的「立委減半」條款；當中包括單一選區的 73 席，採比例代表不分區的 34 席（其中各政黨的不分區席次必須具備至少 1/2 的婦女保障名額），以及保留給山地及平地原住民各 3 席。反觀日本改採新選制之際，仍維持 500 席的眾議院席次，與先前 1993 年舊制時的 511 席相去不遠。雖然 2000 年至今又小幅縮減不分區的名額從 200 席至 180 席，但總數仍達 480 席。

其次，兩者間關於比例代表選票的設計亦略有不同。台灣的比例代表是採全國單一選區，選民投的政黨票是要一起用來分配全國總數 34 席的名額。反觀日本是將全國拆成北海道、東北、北關東、南關東、東京、北陸信越、東海、近畿、中國、四國、九州等 11 個比例代表選區，各區依人口數分配 6 至 29 名不等的比例代表席次。此外，在席次分配公式方面，台灣的政黨需有超過 5% 政黨票方得分配不分區席次，並採最大餘數法 (the largest remainder) 中所謂的「尼邁耶」(Niemeyer) 或「嘿爾 / 尼邁耶」(Hare/Niemeyer) 基數來分配議席。日本方面雖然對於選後的席次分配不另設門檻，但其是採事前門檻的限制規定，即參與比例代表選舉的政黨必須在最近一次全國性選舉（含參議院與眾議院）得票超過 2%、或議席超過 5 席，或是在比例代表選區可提出該比例區 20% 以上的候選人，符合前述三項條件之一始可競逐政黨比例代表席次的分配。至於分配的公式，日本也與台灣不同，是採最高平均數法 (the highest average) 中的頓特 (d'Hondt) 最高平均數法為之。

兩國制度設計最後也是最大的差異，是日本允許所謂的重複列名制度 (dual candidacy) 以及惜敗率 (best-loser propositions) 的設計。所謂重複列名是允許各個政黨在單一選區與政黨比例代表名單同時重複提名同一人參選，透過該途徑，在單一選區敗選的參選人有可能藉由重複列名比例代表名單的方式敗部復活 (Hizen 2007, 290-291; 王業立 2008, 39)。以 1996 年首度採用新選制的第 41 屆日本眾議員選舉為例，是屆選舉除了新進黨在東海及四國兩個比例代表區域沒有重複提名外，其餘各政黨在所有比例代表區中均多少重複提名一些候選人。其中尤以自民黨最為明顯，在當年總共提名 280 位的單一選區參選人當中，便有高達九成以上（共 260 位）的候選人被重複提名於比例代表名單上。

不過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根據日本新選制的設計，單一選區的敗選者如果希望藉由

重複列名的方式來復活，必須藉由所謂的惜敗率以取得比例代表名單上的較佳排序，也就是落選者票數除以當選者的票數比例越高者，他在比例代表名單上的排名越高。從候選人角度觀之，獲重複提名的候選人不只單靠比例代表的得票率，同時也必須努力衝刺提高單一選區的得票率，以防患自己一旦在區域選舉落敗時，以較高的惜敗率復活於比例代表的當選名單上（黃紀、王鼎銘與郭銘峰 2008, 14）。<sup>3</sup> 國外相關研究更指出，日本並立制下的重複列名制度與惜敗率制度，不僅是較諸其它混合選制饒富特色之處，更深遂影響日本各政黨的候選人提名策略與選民投票思維 (Hizen 2007; McKean and Scheiner 2000; Pekkanen, Nyblade, and Krauss 2006)。

表 1 台灣與日本國會混合選制對照表

	台灣立法院	日本眾議院
選票構造	兩票制： 單一選區 + 比例代表	兩票制： 單一選區 + 比例代表
議會規模	113 席 (SMD 73 席；PR 34 席)	500 席* (SMD 300 席；PR 200 席)
選區規模	SMD：73 個單一選區 PR：1 個比例代表區（席次為 34 席）	SMD：300 個單一選區 PR：11 個比例代表區（各區席次介於 6 至 29 席）
選舉規則	SMD：相對多數決 PR：最大餘數計算法分配議席（門檻：政黨得票需超過 5%）	SMD：相對多數決 PR：最高平均數法分配議席 （門檻：選後席次分配不另設門檻，但採選前政黨參選門檻限制）
特殊規範	保留 6 席給原住民（平地、山地各 3 席），仍以舊制單記非讓渡法選之；全國不分區席次中 1/2 為婦女保障名額。	允許重複提名 惜敗率設計

資料來源：參考自 Hizen(2007)、大竹邦實（1996）、王業立（2008），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 日本以 1996 年的制度為準。2000 年日本對於選制做了些許調整，除單一選區席次（300 席）維持不變外，政黨比例代表的名額則從 200 席降至 180 席，目前日本眾議員的總席次為 480 席。

<sup>3</sup> 日本並立式選制下的「重複列名制度」，相關文獻亦稱之為「重複登記制」或「雙重提名制」，由於它的特色在於候選人除了可以參與區域席次的競選外，同時亦可重複列名於政黨比例代表名單上參與比例代表席次的分配，是以該設計亦遭外界認為致使候選人「腳踏兩條船」、「買雙重保險」及「違反主權在民精神」等的批判（王業立 2008, 65；許介鱗與楊鈞池 2006, 122-123）。

## 參、台日國會選舉結果初探

表 2 與表 3 首先實際觀察日本與台灣在選制變革前後，各政黨在國會議員的選舉的得票結果與席次分佈變化。先從日本狀況來看，除了新選制確有使得參與競選的政黨數量逐漸縮減，各黨得票分佈也顯示從 1993 年多黨競爭的狀態（自民黨、社會黨、新生黨、公明黨、日本新黨、共產黨），逐步轉移為 1996 年由少數幾個主要政黨競爭（自民黨、新進黨、民主黨、共產黨）的局面。這樣的結果，勾露出日本政黨數目與政黨體系的形塑，已受到國會選舉競爭結構的規範影響。若以 Laakso 與 Taagepera(1979) 提出的「有效政黨數」(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sup>4</sup> 作為判斷指標，日本在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區的有效政黨數值分別是 3.88 與 4.28，此一結果雖然顯示兩黨體制的改革目標在新制首度實施下未清楚彰顯，但若相較於 1993 年舊制時 5.16 的有效政黨數數值來看，日本在 1996 年時的有效政黨數確已大幅減少，至少展現新制結構對於縮減有效政黨數目的效果。<sup>5</sup>

相較於日本首度實踐新制的結果，表 3 也彙整台灣在 2008 年首度採用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立委選舉結果。從總體結果來看，台灣立委選舉已從 2004 年時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聯等幾個政黨主導政局的局面，轉變為 2008 年由國民黨、民進黨兩雄對峙的戰局，彰顯台灣新選制所造成的兩黨競爭格局較日本更為清楚。進一步從 Laakso 與 Taagepera 的「有效政黨數」來計算，台灣國會的有效政黨數也從 2004 年立委選舉的 3.70，在 2008 年立委大選時大幅縮減至單一選區為 2.13，比例代表區為 2.48。此一整體數據的結果饒富旨趣，後續值得關注的課題便是兩國行使同樣改革軌跡，但初次實踐新制後的政黨體系卻有極大程度的差異，其箇中原因頗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sup>4</sup> 對於國家政黨體系的界定，Markku Laakso 與 Rein Taagepera 提出了相當知名的「有效政黨數」來進行界定，其一般公式為： $N=1/\sum P_i^2$ （N：有效政黨數， $P_i$ ：各政黨的得票率）。如果計算出之有效政黨數數值為 2，係代表呈現兩黨對決的局面，而數值若超過 3，則是顯示呈現多黨競爭的格局。有關「有效政黨數」計算公式的詳細內涵與進一步介紹，可參見 Laakso 與 Taagepera (1979, 3-27)、Taagepera 與 Shugart (1989, 71-81)。

<sup>5</sup> 日本政黨數目縮減的變化情形，可說相當吻合學理上「杜佛傑法則」的預期：新選制下「單一選區制」(SMD) 的採行，將會使得各政黨為了因應新選制的制度誘因與勝選考量，因此進行整合或結盟。進一步來說，由於日本混合式新選制是在區域席次採取 SMD 制，因此將會促使各政治勢力在區域席次上會基於勝選考量，因此趨於僅推派一位候選人參與競逐，而這樣的趨勢最終會演變為兩大政黨的對抗態勢 (Reed 2005; 2007)。國內日本政治觀察家如許介麟與楊鈞池 (2006, 150) 也指出，1994 年後由新生黨與日本新黨所合併而成的新進黨，以及所謂第三勢力民主黨的成立等，均是反應日本新選制誘因結構後的產物。也就是這些在野黨派為了在比例代表名單上爭取更多的當選名額，並且考量小選區參選者的勝選與協調問題，因此紛紛尋求政黨合作或合併的可能，由此我們也不難瞭解新選制結構對於縮減有效政黨數目的實質影響效果。

表 2 1993 至 1996 年日本眾議院選舉結果

	1993 年 (SNTV)		1996 年 (SMD)		1996 年 (PR)	
	得票率	席次比	得票率	席次比	得票率	席次比
自民黨	36.62	43.64	38.63	56.33	32.76	35.00
社會黨	15.43	13.70	--	--	--	--
新生黨	10.10	10.76	--	--	--	--
公明黨	8.14	9.98	--	--	--	--
日本新黨	8.05	6.85	--	--	--	--
共產黨	7.70	2.94	12.55	0.67	13.08	12.00
民社黨	3.51	2.94	--	--	--	--
先驅新黨	2.64	2.54	1.29	0.67	1.05	0.00
社民連	0.73	0.78	--	--	--	--
新進黨	--	--	27.97	32.00	28.04	30.00
民主黨	--	--	10.62	5.67	16.10	17.50
社民黨	--	--	2.19	1.33	6.38	5.50
無黨籍及其他	7.08	5.87	6.75	3.33	2.58	0.00
選舉有效政黨數	5.16		3.88		4.28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自治行政局選舉部管理課（2009），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表中“--”代表該政黨在當年度的選舉時尚未成立或已解散。

表 3 2004 至 2008 年台灣立法委員選舉結果

	2004 年 (SNTV)		2008 年 (SMD)		2008 年 (PR)	
	得票率	席次比	得票率	席次比	得票率	席次比
國民黨	32.83	35.11	55.77	77.22	51.23	58.82
民進黨	35.72	39.56	39.79	16.46	36.91	41.18
親民黨	13.90	15.11	0.30	1.27	0.00	0.00
台聯	7.79	5.33	0.99	0.00	3.53	0.00
新黨	0.12	0.44	0.00	0.00	3.95	0.00
無黨籍及其他	9.64	4.45	3.15	5.06	4.38	0.00
選舉有效政黨數	3.70		2.13		2.48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09），作者自行整理。



值得釐清的一項概念是，上述集體層次 (aggregate level) 資料雖已初步呈現選制變革前後兩國政黨版圖的演變情形，但在解讀這些集體資料時，必須謹慎瞭解到它與選民實際投票行為的慣性與脈絡並不一定一致。從縱向時序的角度觀之，集體層次資料僅提供每年獨立的橫斷面訊息，假設一政黨支持的比例一直是 50%，僅藉由集體資料所提供的資訊並無法判斷究竟是有特定 50% 的選民持續穩定的投給該黨，還是每次選舉選民都有 50% 的機率會選該黨。儘管二者在集體資料所顯示的結果是一致的，但第一種情況顯示出選民投票完全沒有變動 (turnover)，選民習慣且穩定的投給該黨，第二種情況則其實票源會有相當高的變動率。再就兩票選制的分析來說，集體資料無法呈現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兩得票率間的關連，例如表 3 當中在單一選區投給國民黨的那 55.77% 的選票，並不一定跟政黨票的 51.23% 完全重疊。是以一般對投票行為的研究，多半是以個體民調資料為主，這樣不僅達到一般集體資料估算淨變量 (net change) 的目的，還可以進一步觀察選民在不同時期跟不同選票上的差異，也就是可以針對總變量 (gross change) 進行估算 (黃紀 2005；黃紀、王鼎銘與郭銘峰 2005)。也因為個體資料的這種實用性，許多學者便直指當研究目的是在解釋個人行為時，仍應盡量回歸至選民個體為分析單位 (如 Huang, Chen, and Chou 2008; Wright 1989; 黃紀 2001；2005；2008a；2008b)。究此，本文接下來將應用台灣跟日本所蒐集到的個體層次民調資料，更深入的分析選民在選制變遷過程當中的一些變化。

## 肆、混合選制下兩票結構的連動效果

學界對於混合選制兩票結構所導致相關政治效應的爭辯，主要可依兩票間互動效果的彰顯與否，歸納為獨立效果與連動效果兩派不同的主張 (Herron and Nishikawa 2001; Huang, Chen, and Chou 2008；林繼文 2008)。首先，部分學者認為由於混合選制是包括「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制」兩種制度，因此探討兩種選票結構的相關政治效應時 (如選民投票決策、政黨體系形塑)，必須視為各自獨立的不同實體 (separate entity)，並且分別估算「單一選區」(SMD) 與「比例代表」(PR) 的政治效應後，再予以彙總進行分析 (Moser and Scheiner 2004; Stratmann and Baur 2002)。也就是說，主張此種論點的學者認為，混合選制下國家政黨體系的形塑與選民投票抉擇的思維，將如同杜佛傑法則 (Duverger's Laws) 的預期，將各自根據兩票選制結構的不同規範內涵，表達選舉投票上的喜好。因此，在這樣的狀態下，選民的兩票投票抉擇便有可能與心中屬意政黨的偏好產生不一致的現象 (Bawns 1993; Moser 1997)；迥異於兩票互不影響的論點，如 Ferrara 與 Herron(2005)、Herron 與 Nishikawa(2001) 等則強調不容小覷兩種選票結構可能產生的連動

或感染效果。贊同此一論點的學者指出，不論是政黨參與選舉競爭時的候選人提名策略、亦或是選民對於兩種選票的抉擇，甚或是最終的政黨體系形塑，均會綜合兩種選制不同計算方式來進行理性的決策，因此他們認為如果要判準混合式選制所可能產生的政治效應，應將兩票交互影響的效果納入考量。Ferrara 與 Herron(2005) 更直指，由於兩票抉擇相互影響之感染效果的存在，因此對政黨（特別是小黨）來說會有相當高的誘因，儘量在單一選區提名候選人參選，增加能見度以增加選民對政黨投票支持的一致性，藉此以改善政黨在比例代表票的得票表現。

雖然前述兩項論點均看似合理，但如何有效觀察混合制下兩票的實際互動狀況，學界看法目前仍莫衷一是。不過根據 Huang、Chen 與 Chou(2008, 6) 的論點，真正的檢驗方式仍應從個體層次的資料，也就是觀察選民投票行為是否是策略性思考而產生分裂投票現象，亦或是如連動效果的理論預期般會產生兩票相互影響的一致投票行為。準此，爲了進一步比較台、日的差異，我們爰引一致與分裂投票的概念來進行分析。所謂「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 通常是指同一次選舉選民投兩張或以上的選票，而將其分別投給不同政黨候選人，反觀若選民把不同選票投給相同政黨的候選人，則可視為「一致投票」(straight-ticket voting) (黃紀 2001)。<sup>6</sup> 換句話說，若選民在新選制的兩票結構下將選票分別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即可知悉彼此交互作用小，感染效果便不明確；反之若一致投票的情形明顯，顯見選民在考量如何行使兩張選票時，會有連動的影響。<sup>7</sup>

關於影響選民一致分裂投票的因素，政黨認同的弱化 (Wattenberg 1990; 1991)、保守改革心態 (Flanagan and McDonald 1979) 等都是過往研究強調的重點，但除了這些心理層面的作用外，黃紀 (2008b, 137) 曾指出台、日兩國國會新選制的結構因素，對一致分裂投票的影響應同樣受到重視。以日本為例，新選制相當饒富特色的地方在於允許各個政黨在單一小選區與比例代表名單同時重複提名同一人參選，藉由重複列名的方式，讓單一選區敗選的參選人可藉由政黨比例代表的方式復活 (Pekkanen, Nyblade, and Krauss 2006,

<sup>6</sup> 狹義的一致與分裂投票研究泛指選民同一時間對不同公職選票的決定，並且是以行政首長與國會議員同時舉行的公職選舉爲主要探討標的 (Burden and Kimball 1998; Fiorina 1996)，但根據 Schoen(1999)，Gschwend、Johnston 與 Pattie(2003) 等人的看法，在採行混合式選制的國家，由於每逢同屆國會改選，選民同時將會獲得兩張選票來進行圈選，一票投入、一票投黨，此時如果選民不把兩張選票支持同一政黨及其候選人，也是屬於廣義的分裂投票行為。

<sup>7</sup> 選民投票行為上的策略投票 (strategic voting) 與分裂投票現象，經常在混合選制的文獻被拿來一併討論。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投票模式在兩票制的應用概念上，仍存在些許差異。根據 Duverger(1954) 所提的「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小黨支持者在單一選區會採策略棄保的決定，而在比例代表票上忠誠支持小黨，形塑出與分裂投票一樣的現象。然而，並非所有分裂投票行為一定是源自於選民的策略投票，因爲除了策略性思維外，還有可能是因候選人魅力、個人政黨偏好等因素的影響 (黃紀 2008b, 135-136; 黃紀、王鼎銘與郭銘峰 2008, 11-12)。

185; 吳明上 2003, 86)。此一設計除了提高候選人當選的機率外，還可鼓勵優秀政治領袖或菁英下鄉參選，拉高政黨支持度與得票率（吳東野 1996, 79；許介麟與楊鈞池 2006, 118）。加上惜敗率的設計，使獲重複提名的候選人不只單靠比例代表的票數，同時自己也必須在單一選區努力衝刺，以提高自己在比例代表名單上的排序與當選機率 (Pekkanen, Nyblade, and Krauss 2006, 185-186)。日本如此的選票計算方式，根據 Pekkanen、Nyblade 與 Krauss(2006) 的研究指出，應會對選民投票思維造成影響，並降低了兩張選票分開投票的可能。相關文獻更直指，日本式並立式選制下的重複列名制度，可能會引發選民對於區域候選人與政黨票的圈選時，因重疊的候選人而有相當程度之關連（黃紀 2008b, 138；黃紀、王鼎銘與郭銘峰 2008, 13-14）。

除了重複列名的設計外，台灣與日本在比例代表選票結構的一些差異，也會造成兩者間一致分裂投票狀況的不同。這當中包括比例代表選區的規模、政黨票的計算門檻，以及比例代表席次的計算公式等。首先就比例代表選區規模的影響來看，根據 Leys(1959)、Sartori(1968) 等人的研究，比例代表制下如果選區規模較小席次較少的情況，由於席次不夠等比例的按選票結果來分配，選民會有如同在多數決時般的疑慮，因危恐支持小黨浪費選票，而策略性地選擇投票的對象。換句話說，Duverger 推論單一選區下的策略投票，在規模較小的比例代表制下仍舊會發生。此一推論，透過 Cox(1990) 對比例代表制下政黨數量的數理推導，事實上已經得到印證；Cox 發現比例代表的選區規模越小越會造成政黨數目減少的向心效果 (centripetal effect)，而選區規模越高的話才會造成政黨數目增加離心效果 (centrifugal effect)。以日本比例代表選區的狀況而言，由於將全國分為 11 個選區，選區名額再依人口狀況分配 6 到 29 個不等的席次，相較於台灣的不分區是採全國單一選區共 34 名額，日本不分區的規模較小，因此較易促使策略性投票，亦使得分裂兩票的可能性較台灣來得低。

另一有助於增加比例代表性及兩票連動性的因素在於比例代表席次分配上政黨門檻 (thresholds) 的限制。基本上許多單純採行比例代表的國家都訂有得票率需跨越最低門檻的限制，否則無法分配席次，像西班牙與丹麥分別需要 3% 與 2% 的得票率，採全國單一選區比例代表的以色列跟荷蘭，門檻更低到僅分別為 1.5% 及 0.67% 的選票 (Norris 2004, 52-53)。像台灣採 5% 的高門檻設計並不多見，最大的影響便是提高選民策略性集中選票給大黨的動機，並進而抑制小黨在不分區存活的機會。最後關於席次的計算公式，台、日分別採用所謂的最大餘數法跟最高平均數法來進行，根據 Rae(1971, 31-36) 比較兩種公式後發現，最高平均數法的計席公式對大黨有利，而最大餘數法並未特別對哪一類型政黨有利，反而是小黨分配席次的機會較高。更重要的是，台灣採用最大餘數法中嘿爾 (Hare) 基數的計席方式，被 Farrell(2001)、Lijphart(1994) 等人的研究發現，是所有不同比例代表

制中最能產生比例結果的一種。換言之，若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由於最高平均數法亦對大黨較有利，所以相較於台灣兩票間的分歧應該會較小，日本一致投票的情況應該會較高。

綜觀台灣跟日本的制度設計，都多少有些有利跟不利選民一致投票，或是策略性集中選票給大黨的情況。如日本重複列名跟惜敗率的設計、PR 名單較少、最高平均數法計算選票等，都有利於日本選民一致投票；反觀台灣主要是超高政黨門檻的設計，會恫嚇選民投政黨票給小黨，進而使得分裂投票可能性降低。由於這些設計本身的複雜及衝突，下節將直接從選民投票行為著手，觀察兩國新選制下的差異究竟有多大。

## 伍、台日選民一致分裂投票的比較分析

本節開始使用分別蒐集自兩國的民調資料，觀察選民在兩票結構展現的投票變異，以實際驗證上述兩票連動效果的討論。日本資料是由日本東京大學蒲島郁夫等（1998）五位教授所組成的「日本人の選舉行動研究會」，在九〇年代間所執行「日本選舉研究計畫」（JES）的民調資料為分析素材。是項研究自 1993 年 7 月的日本眾議員大選前開始，到 1996 年 10 月的日本眾議員選舉結束後，總共進行了七回的調查訪談。本文對於日本眾議員選舉的分析，是引用是項研究在 1996 年選後面訪調查有效回收的 2,299 份資料（JES1996），以及 1993 年至 1996 年均有效定群追蹤調查的 589 份樣本。台灣部分，則是引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在 2008 年所彙整釋出的立委選舉民調資料（TEDS2008L）。本文對台灣立委選舉的分析除了採用選後獨立面訪的 1,238 份有效樣本外，另外也採用 2004 至 2008 年選舉問卷的 1,380 份定群追蹤樣本來進行分析。<sup>8</sup>

表 4 與表 5 分別根據 JES1996 與 TEDS2008L 選後獨立面訪，解析台、日兩國首度實踐單一選區兩票制後，在 SMD 與 PR 的一致分裂投票情形。首先透過卡方檢定，我們可以看出兩國選民對於新制的兩票抉擇並非完全獨立，Cramer's V 值更進一步顯示兩票抉擇之間至少是具有中強度的關連性。更觀察細項結果，兩國主要政黨在兩項選票其實都獲得選民頗高程度的一致性支持；台灣在 SMD 支持國民黨與民進黨候選人的選民，分別有高達 82.78% 與 82.20% 會繼續在第二張政黨票上維持偏好；至於日本方面，在 SMD 支持自民黨、新進黨、民主黨的人，分別有 81.23%、79.16%、67.89% 在 PR 名單投同一政黨。

<sup>8</sup> 本文使用的資料係採自「2005 年至 2008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II）：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TEDS2008L）。「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為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TEDS2008L 為針對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執行的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台灣大學朱雲漢教授。更詳細的資料內容說明，請參閱 TEDS 網頁，網址：<http://www.tedsnet.org>。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表 4 1996 年日本眾議院選舉選民一致分裂投票分析表

SMD \ PR	自民黨	新進黨	民主黨	左派政黨	其他	總計
自民黨	658 (81.23%) [87.62%]	38 (4.69%) [8.50%]	62 (7.65%) [22.06%]	50 (6.17%) [15.97%]	2 (0.25%) [6.06%]	810
新進黨	42 (9.31%) [5.59%]	357 (79.16%) [79.87%]	33 (7.32%) [11.74%]	17 (3.77%) [5.43%]	2 (0.44%) [6.06%]	451
民主黨	15 (6.88%) [2.00%]	22 (10.09%) [4.92%]	148 (67.89%) [52.67%]	25 (11.47%) [7.99%]	8 (3.67%) [24.24%]	218
左派政黨	12 (4.67%) [1.60%]	17 (6.61%) [3.80%]	19 (7.39%) [6.76%]	204 (79.38%) [65.18%]	5 (1.95%) [15.15%]	257
其他	24 (26.97%) [3.20%]	13 (14.61%) [2.91%]	19 (21.35%) [6.76%]	17 (19.10%) [5.43%]	16 (17.98%) [48.48%]	89
總計	751	447	281	313	33	1,825

1. Test of independence:  $X^2=2603.02$ ,  $df=16$ ,  $p<0.001$ ,  $N=1,825$ 2. Measures of association: Cramer's  $V=0.60$ 

資料來源：蒲島郁夫等（1998），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 ) 內代表橫列百分比；[ ] 內代表縱行百分比。本表之左派政黨係代表共產黨與社民黨。

表 5 2008 年台灣立委選舉選民一致分裂投票分析表

SMD \ PR	國民黨	民進黨	其他	總計
國民黨	298 (82.78%) [83.01%]	21 (5.83%) [9.01%]	41 (11.39%) [60.29%]	360
民進黨	25 (10.59%) [6.96%]	194 (82.20%) [83.26%]	17 (7.20%) [25.00%]	236
其他	36 (56.25%) [10.03%]	18 (28.13%) [7.73%]	10 (15.63%) [14.71%]	64
總計	359	233	68	660

1. Test of independence:  $X^2=377.51$ ,  $df=4$ ,  $p<0.001$ ,  $N=660$ 2. Measures of association: Cramer's  $V=0.53$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 ) 內代表橫列百分比；[ ] 內代表縱行百分比。

從上述結果來看，選民一致投票支持大黨的情形，兩國其實都相當明顯，而台灣情況又較日本稍高。我們認為這與台灣政壇因應新選制變革，選前即進行的政黨重組不無關係。特別是選前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均相當順利匯整泛藍跟泛綠各自的勢力基礎，因此絕大多數選區已形成兩黨候選人對決的局面。相較之下，雖然 1996 年日本政壇也有因應新選制的整合，<sup>9</sup> 但除了最大勢力的自民黨外，新進黨、民主黨等在野黨派意見仍頗為分歧，因此無法順利結合成足以抗衡自民黨的第二大政治勢力。據此，在面臨在野勢力不易整合的困境下，日本選民對於其他在野黨派也很難形塑出強烈的認同意識，因此導致日本選民對在野黨派一致投票支持率稍微偏低。<sup>10</sup>

根據兩表顯示的選民一致投票狀況，另一項重要推論是用以呼應選區總體資料的結果，即台灣對於兩黨體制的形塑目標會較日本來得明顯。從台灣國、民兩黨在 SMD 及 PR 選票分佈狀況來看，兩黨合計囊括九成比例選民的支持，根據政黨體制的相關公式，可說是完全符合兩黨競爭的格局；相較之下，日本選票集中的情況稍嫌遜色，從表 4 邊緣分佈 (marginal distribution) 的數字來看，日本最大的自民黨與新進黨在合計在 SMD 與 PR 共囊括受訪者  $69.10\% (= (810+451)/1825)$  與  $65.64\% (= (751+447)/1825)$  比例的支持而已。

為了進一步凸顯兩國政黨體系形塑過程的差異，我們更仔細觀察表 4 與表 5 中之小黨支持者在新制下的變異。特別是根據杜佛傑法則來看，小黨支持者可能因該黨候選人當選機率不高而在 SMD 區域選舉採策略投票；但在 PR 政黨票上，由於議席的計算較能貼近選票的代表性，因此小黨支持者較有可能將票投給心中真實偏好屬意的政黨，也就是展現所謂的「真誠投票」(sincere voting) 模式。是以在混合選制的兩票結構中，制度的設計用意是即便選民在 SMD 會策略性集中選票，仍可用 PR 來提升弱勢政黨跟族群的代表性。不過根據表 4 與表 5 之小黨支持分佈的狀況，這種制度誘因在台、日兩國首次實踐時是有些許差異。根據縱行百分比 (column percentage) 的觀察，台灣在 PR 選票中支持小黨的選民，有高達超過八成五 ( $=60.29\%+25.00\%$ ) 在 SMD 轉向支持最具競選實力的國、民兩大政黨，繼續維持原有政黨偏好、支持該黨區域候選人的比例最多僅有 14.71% 之譜。相較

<sup>9</sup> 1994 年日本變革新選制後，各政黨為因應新選制結構下的制度誘因與勝選考量，所進行整合的明顯勢力為新進黨與民主黨。新進黨是以小澤一郎為首，主要是彙整原本的新生黨、日本新黨、公明黨、民社黨等勢力，並於 1994 年 12 月建立；另外，民主黨則是在 1996 年眾院大選前，由曾經擔任內閣厚生大臣的菅直人、以及曾擔任先驅新黨幹事長的鳩山由紀夫等所領導組成，該黨的成立主要是希望藉由吸收各黨的游離青年議員，以成為抗衡自民黨、新進黨的第三勢力（許介麟與楊鈞池 2006, 150-151）。

<sup>10</sup> 日本政黨的重組變化極為迅速，例如新進黨在 1996 年敗選之後，旋即便引發黨內的鬥爭，並且隨之瓦解改組為民主黨等其他政黨。許多日本研究文獻也指出當時日本政黨的政治組合僅是考量短期的政治利益，因此九〇年代日本在野黨派的分合離散由此便不難理解。此點也是導致選民對於在野政黨認同感不強的主要原因（許介麟與楊鈞池 2006；楊鈞池 2001）。

之下，日本第一次施行該制時，在 PR 支持小黨並且在區域選舉繼續給予小黨支持的比例高達 48.48%，只有 36.36%(=6.06%+6.06%+24.24%) 的比例轉向支持當時政壇較具實力的自民黨、新進黨或民主黨。

前述的分析，顯見台日改採新選制後，兩國小黨選民的支持者確實如杜佛傑法則的預期般，展現某種程度的策略投票現象，並且台灣小黨的支持者在區域選舉中展現策略投票行為的比例是高過於日本。頗饒富趣味的是，進一步從橫列百分比 (row percentage) 的分析，本文更進一步發現到兩國小黨支持者的投票差異所在。先從表 4 日本的狀況來看，在 SMD 投票給主要政黨的選民有極低的比例會在政黨票轉投給小黨（最高的民主黨僅 3.67%），更重要的是，在 SMD 支持其他小黨的選民，理論上在政黨選票上應該更會一致支持該政黨；但事實上卻不盡然，我們發現 SMD 支持小黨候選人的選民，其政黨票的選擇反而相當平均分佈在各政黨之間，繼續支持小黨者僅占 17.98%。相較之下，表 5 所顯示台灣狀況則呈現相當迥異的結果。區域選舉票投小黨的選民，仍有相當大幅度的比例會在政黨票上轉而支持國、民兩大黨，共計有 83.38%(=56.25%+28.13%)。這樣的結果事實上與混合制的設計可說背道而馳，但也凸顯台灣特殊的 5% 政黨選票高門檻的副作用，已對第二選票抉擇造成實際影響。

## 陸、選制變革過程中的穩定與變遷投票

前述分析已運用台、日兩國不同時期橫斷面民調，以一致分裂投票的概念判斷兩國首度實踐新選制的投票行為差異。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架構並無法縱向觀察選民在選制變革前後的投票慣性與脈絡。事實上自「杜佛傑法則」問世以來，不同選制對選舉行為及政黨體制會產生不同影響，幾已成為無庸置疑的一項鐵律。根據 Duverger(1954, 217-219; 1986, 70) 的推論，採行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傾向發展出兩黨制，採行比例代表選制則會產生許多相互獨立的多黨競爭體系，而採行兩輪決選制則是會助長出多黨聯盟的產生。肇致這樣結果的原因，除了選制本身的機械性因素 (mechanical factor) 外，最重要的就是選民在不同選制會有不同的策略思維與投票抉擇。簡單來說，Duverger 認為採用多數決的選票結構，選民若把票投給不具競選實力的小黨形同浪費，因此選民自然地會把選票往較不討厭的大黨集中，以防範他最厭惡的政黨參選人當選，此一現象稱為「心理因素」或「策略性投票」(Duverger 1954, 226; Galbraith and Rae 1989, 126; Riker 1986, 34-35; 王業立 2008, 43)。

Duverger 對單一選區多數決下的註解並未引發太多爭議，許多研究進一步衍生在複數選區的選舉，選民同樣會珍視自己選票的效用，進而在投票決定上展現其策略性思考與

行為。如 Gary Cox(1994; 1997) 以日本為例，觀察到九〇年代 SNTV 的國會選舉中，選民會策略轉移實力超強或沒有當選勝算的選票到其他的同黨候選人身上，以力求屬意政黨席次的增加，此即所謂邊際候選人 (marginal candidates) 最適化原則 (Cox 1997, 102)。這種複數選區中黨內 (intra-party) 選票位移的現象，國內學者王鼎銘 (2003)、黃秀端 (2001) 等在觀察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當中，也提出類似的佐證。根據他們的研究，台灣採行 SMD 的行政首長選舉，會產生 Duverger 推論的黨際 (inter-party) 選票位移，但在 SNTV 複數選區制度的議員選舉，選民的投票思惟則變成以同黨候選人間的票源移轉為主。

至於新興的混合選制，是希望結合 SMD 與 PR 兩種不同選制的優劣，藉此能夠在民意代表性與政府效能兩者間取得折衷平衡。由於兩票制的基本精神是整合兩種不同體制，是以從 Duverger 的理論基礎來看，不難發現在推論投票行為上的實際複雜性。換句話說，當選制變遷從 SNTV 轉向 SMD 時，選民應會集中選票在主要政黨身上，並進一步促使國家政黨體系往兩黨制方向前進；但若考量第二張 PR 選票作用，由於 PR 比 SNTV 更具比例代表性，選民每張選票更容易在轉讓席次中展現出來，是以第二張選票會真誠反應他偏好的政黨，而不採取所謂的策略性投票，因此第一張選票往兩黨集中的趨勢難免會被削弱。<sup>11</sup>

雖然過往演繹 Duverger 論點的文獻多採集體資料，判讀選制對於投票行為及政黨體系的影響，但 Duverger 的理論，特別是心理層面的策略投票，最好的方式還是應藉選民的角度方得以精準判斷 (黃紀 2008a, 3)。究此，本文接下來將援引選民跨時序「投票穩定與變遷」(electoral stability and change) 的概念，剖析台、日兩國選民在選制變遷的投票改變幅度與箇中差異。所謂的投票穩定或投票變遷，指的是選民在不同時期選舉時所作的投票決定 (Shively 1982)，由於選民行為與態度通常具有穩定的特性，Leithner(1997) 稱之為「行為黨性」(behavioral partisanship)，來代表選民在連續兩次或者是多次選舉中，將選

<sup>11</sup> 許多研究顯示 SNTV 與 SMD 間除了應選席次的選區規模 (district magnitude) 有差異外，兩選制間有許多類似之處：其一，兩項選制均是將全國地理疆界劃分為數個固定選區，選區應選人數均必須事先規定清楚；其二，兩選制的投票方法均是每人一票，且最終的選票計算方式是不可讓渡給其它候選人；第三，兩項選制均是規定候選人的得票數必須在應選名額內才可以當選。因此在選區應選區席次為一席時，SMD 其實可視為 SNTV 的一種特例 (Cox 1997, 101; 王鼎銘 2003, 106-107)。不過就政黨得票率與議席比的角度來看，謝復生 (1992, 19)、王業立 (2008, 97) 等則指出，由於 SNTV 獲得當選所必須取得的安全門檻票數，是介於必須取得超過總有效票數相對多數之 SMD 選制、與按照各政黨得票率分配議席的 PR 制之間，因此 SNTV 選制下所換算出來的政黨得票率與議席比例代表性，通常是會介於 SMD 與 PR 之間，而且選區愈大的話，政黨席次比例代表性會愈形彰顯，是故許多學者亦將 SNTV 制稱之為「半比例代表制」(semi-proportional system)(Lijphart 1994, 10;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 28) 或「準比例代表制」(村松岐夫、伊藤光利與辻中豐 2001, 143-145)。



票投給同一個黨派的傾向。本文藉此概念，用以觀察投票慣性在不同選制之下是否會受影響。這部分由於涉及跨時序的選舉資料，下節將改採定群追蹤資料 (panel data) 繼續觀察兩國選民的行為差異。

## 柒、台日選制變遷過程的選票移轉比較

定群追蹤資料意指在數個時間點，針對相同一群樣本進行調查訪談所蒐集而成的一種數據型態，由於不僅對兩次選舉政黨得票情形的淨變量 (net change) 做觀察外，同時可以反映個體選民縱跨時間動態變化的總變量 (gross change)，所以是研究選舉穩定與變遷的最佳資料型態（黃紀 2005）。日本 JES II 及台灣 TEDS2008L 的民調資料，都難得地提供選制變遷過程中的定群訪談資料，可謂彌補一般選舉研究在這方面資訊的不足，也深化了兩國資料比較的堅實基礎。值得一提的是，定群追蹤資料是屬於一種關聯樣本，前述分析橫斷面資料上的卡方值 ( $X^2$ ) 獨立性檢定並不適用，本節將改採檢測淨變量增減與邊緣同質性分佈 (marginal homogeneity)，適用於兩個關聯樣本的 McNemar's test 為之，以觀察台、日兩國大黨跨時得票淨變量的變化情形。

首先，表 6 與表 7 呈現兩國選民從 SNTV 轉變到 SMD 的動態轉移情形。表 6 顯示日本變革眾議員選制後，自民黨雖然仍鞏固 77.72% 既有票源的多數支持，但仍然有 22.28% 的比例跑票，將票轉投給其他政黨的候選人。表 7 則呈現 2004 年投給國民黨候選人的選民，在新選制下有高達九成以上的比例是繼續給予國民黨支持，跑到其它政治勢力的比例僅 9.49%。所以就兩國長期獨大的兩個政黨來看，國民黨似乎在新選制下比日本的自民黨更能掌握其既有票源的支持。此外，由國民黨得票淨變量增加 21.22%(=59.55%-38.33%) 高於自民黨的 6.66%(=47.47%-40.81%) 來看，它也更有效地從其它政治勢力擷取票源過來。不過兩者 McNemar's test 均具統計顯著水準，因此都可說驗證了 SMD 促使選票集中大黨的趨勢。

表 6 1993 至 1996 年日本選民投票轉移分析表 (SNTV 至 SMD)

SNTV \ SMD	自民黨	其他政黨	總計
自民黨	157 (77.72%) 〈31.72%〉	45 (22.28%) 〈9.09%〉	202 (100.00%) 〈40.81%〉
其他政黨	78 (26.62%) 〈15.76%〉	215 (73.38%) 〈43.43%〉	293 (100.00%) 〈59.19%〉
總計	235 (47.47%) 〈47.47%〉	260 (52.53%) 〈52.53%〉	495 (100.00%) 〈100.00%〉

McNemar's test:  $X^2=8.85$ ,  $df=1$ ,  $p<0.01$ 

資料來源：蒲島郁夫等（1998），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 ) 內代表橫列百分比；〈〉內代表聯合百分比。

表 7 2004 至 2008 年台灣選民投票轉移分析表 (SNTV 至 SMD)

SNTV \ SMD	國民黨	其他政黨	總計
國民黨	229 (90.51%) 〈34.70%〉	24 (9.49%) 〈3.64%〉	253 (100.00%) 〈38.33%〉
其他政黨	164 (40.29%) 〈24.85%〉	243 (59.71%) 〈36.82%〉	407 (100.00%) 〈61.67%〉
總計	393 (59.55%) 〈59.55%〉	267 (40.45%) 〈40.45%〉	660 (100.00%) 〈100.00%〉

McNemar's test:  $X^2=104.26$ ,  $df=1$ ,  $p<0.01$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 ) 內代表橫列百分比；〈〉內代表聯合百分比。

除了大黨在新制 SMD 下的選票聚集，混合選制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張政黨票的設計。從表 8 日本自民黨選民的得票淨變量來看，兩屆選舉中自民黨從 SNTV 轉移到新制 PR 選票僅增加 3.43%(=44.24%-40.81%)，不具統計顯著水準 (McNemar's test:  $p>0.10$ )。此一現象其實頗為吻合理論的預期，也就是 PR 下較易展現選民真誠投票，選票不會有集中大黨的現象。相對之下，國民黨從 SNTV 至 PR 得票淨變量不僅高達 14.09%(=52.42%-38.33%)，McNemar's test 更具統計顯著水準。雖然台灣情形呈現 PR 選

票仍有策略集中的現象，與學理預期不符，但若考量政黨選票超高的 5% 席次分配門檻，台灣選民避免浪費政黨票的心態就不難理解。

表 8 1993 至 1996 年日本選民投票轉移分析表（SNTV 至 PR）

SNTV \ PR	自民黨	其他政黨	總計
自民黨	161 (79.70%) 〈32.53%〉	41 (20.30%) 〈8.28%〉	202 (100.00%) 〈40.81%〉
其他政黨	58 (19.80%) 〈11.72%〉	235 (80.20%) 〈47.47%〉	293 (100.00%) 〈59.19%〉
總計	219 (44.24%) 〈44.24%〉	276 (55.76%) 〈55.76%〉	495 (100.00%) 〈100.00%〉

McNemar's test:  $X^2=2.92$ ,  $df=1$ ,  $p>0.10$

資料來源：蒲島郁夫等（1998），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內代表橫列百分比；〈〉內代表聯合百分比。

表 9 2004 至 2008 年台灣選民投票轉移分析表（SNTV 至 PR）

SNTV \ PR	國民黨	其他政黨	總計
國民黨	217 (85.77%) 〈32.88%〉	36 (14.23%) 〈5.45%〉	253 (100.00%) 〈38.33%〉
其他政黨	129 (31.70%) 〈19.55%〉	278 (68.30%) 〈42.12%〉	407 (100.00%) 〈61.67%〉
總計	346 (52.42%) 〈52.42%〉	314 (47.58%) 〈47.58%〉	660 (100.00%) 〈100.00%〉

McNemar's test:  $X^2=52.42$ ,  $df=1$ ,  $p<0.01$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內代表橫列百分比；〈〉內代表聯合百分比。

由於 McNemar's test 受限於  $2 \times 2$  的列聯表分析，表 7 與表 9 的分類無法精確反應台灣另一主要政黨民進黨的狀況。更重要的是，前面發現國民黨在新制下不僅鞏固更能開拓票源，其實可說反應民進黨同一時期勢力的衰退，因此觀察民進黨縱貫選制變革前後

的變化益形重要。<sup>12</sup> 根據表 10 及表 11 的結果，原本的民進黨支持者僅 71.77% 在新選制下支持民進黨區域候選人，即便較不受人選影響的政黨票，穩定支持度也不到七成五，這都低於兩國其他主要政黨的數據。更重要的是，民進黨從 SNTV 到 SMD 得票的淨變量為 -2.73%(=34.85%-37.58%)，SNTV 至 PR 得票淨變量是 -1.52%(=36.06%-37.58%)，雖然統計檢定並不顯著，但兩張選票都未增長的現象已昭然若揭。事實上回首台灣選制轉變的這四年當中，不難發現民進黨執政的政治醜聞不斷，包括陳水扁總統的國務機要費案、吳淑珍女士的 SOGO 經營權弊案、女婿趙建銘涉及的台開炒股案，均使得民進黨的滿意度陷入空前低迷的氣氛。2006 年 9 月由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所發起反貪倒扁的「紅衫軍運動」，更重創民進黨形象與支持度（蔡佳泓 2008）。若再加上 2008 年選舉時採用排藍條款來選取 PR 名單，這些恐怕都是直接或間接抵銷新選制對大黨保障的原因。不過本文受限於資料提供的訊息不足，並無法對各政黨實力消長乃至新制兩票變化關連做更深入分析，相關課題將留待未來研究進一步討論。

表 10 2004 至 2008 年台灣選民投票轉移分析表（SNTV 至 SMD）

SNTV \ SMD	民進黨	其他政黨	總計
	民進黨	其他政黨	總計
民進黨	178 (71.77%) 〈26.97%〉	70 (28.23%) 〈10.61%〉	248 (100.00%) 〈37.58%〉
其他政黨	52 (12.62%) 〈7.88%〉	360 (87.38%) 〈54.55%〉	412 (100.00%) 〈62.42%〉
總計	230 (34.85%) 〈34.85%〉	430 (65.15%) 〈65.15%〉	660 (100.00%) 〈100.00%〉

McNemar's test:  $X^2=2.66$ ,  $df=1$ ,  $p>0.10$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內代表橫列百分比；〈〉內代表聯合百分比。

<sup>12</sup> 本文內容主要希望比較台日兩國長期獨大政權優勢的政黨，即自民黨與國民黨在新選制變革前後的支持變化。特別是九〇年代日本執政權雖有更迭，但仍以自民黨佔居優勢，再加上自民黨之外的在野政黨頻繁分合，若納入其他在野勢力起伏的分析恐怕更難有共同比較的基礎。相較之下，國民黨在台灣 2008 年的立委選舉雖獲有絕對的勝選優勢，但民進黨已主導過兩屆中央政府的執政大權，加上國內政黨一般研究習慣對民進黨勢力的變化投注同樣的關懷，是故本文進一步將當時執政的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票源興衰進行對比分析，希望藉此讓讀者更能瞭解當時台灣政黨勢力起伏的箇中緣故。

表 11 2004 至 2008 年台灣選民投票轉移分析表 (SNTV 至 PR)

SNTV \ PR	PR		
	民進黨	其他政黨	總計
民進黨	185	63	248
	(74.60%)	(25.40%)	(100.00%)
	〈28.03%〉	〈9.55%〉	〈37.58%〉
其他政黨	53	359	412
	(12.86%)	(87.14%)	(100.00%)
	〈8.03%〉	〈54.39%〉	〈62.42%〉
總計	238	422	660
	(36.06%)	(63.94%)	(100.00%)
	〈36.06%〉	〈63.94%〉	〈100.00%〉

McNemar's test:  $X^2=0.86$ ,  $df=1$ ,  $p>0.10$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 ) 內代表橫列百分比；〈〉內代表聯合百分比。

## 捌、結語

近十幾年來國內外學界對混合選制兩票架構的相關討論相當的多，不論是對選制的起源、選制設計內涵及其概念界定、政黨參選策略分析與投票思維、混合選制對國會立法行為的影響，甚或對於國家政黨體系的形塑影響等，都是學界矚目的焦點。此外，各界對於混合選制的探討也關注到制度設計變異 (institution variation) 所可能造成的影響，並據以進行跨國性的比較分析 (Cox and Schoppa 2002; Gallagher 1998)。就位居東亞關鍵位置，並具備類似政經發展背景的日本與台灣而言，兩國先後通過國會選制的變革，並且不約而同採用所謂的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如此類似的政治改革背景，可說提供跨國選舉比較相當堅實的背景。本文在此基礎之上，特別歸納整理兩國選制之選舉規則、選票結構、選區規模、選舉門檻等差異，並具體呈現選民在新選制下的投票偏好。

從「日本選舉研究」(JES) 與「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兩組資料的分析，我們發現兩國選制從 SNTV 變革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過程中確有差異。資料顯示，首度實踐新選制雖使兩國主要政黨獲得選民在兩張選票上，頗高程度的一致支持，但由於台灣選前政黨勢力的整合較為順利，加上超高政黨門檻票的限制，使得 PR 選票並無法實際嘉惠小黨，造成台灣選民即便在政黨票上亦有策略投票的現象，此也直接影響到兩國不同政黨體系的形塑。此外，本文透過跨時序的定群追蹤資料，亦發現台灣選民對於主要政黨的一致與穩定支持態度，在這選制變遷過程中比起日本來得明顯。本文雖然檢證許多混合選制的結構設計，但畢竟尚屬探索性質的研究 (exploratory study)，受限於資料並無法對舊制跟

新制、以及兩票連動背後影響因素做進行進一步探究。但最重要的還是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發學界未來能深入逐一探究兩國選制各項細部規定，對於選民投票行為乃至政黨體系的影響，提出更具系統性的經驗資料驗證，也為混合選制的學理驗證提供更具深度的貢獻價值。

\* \* \*

投稿日期：98.03.30；修改日期：98.06.08；接受日期：98.08.07

## 參考文獻

### I. 中文部分

- 牛銘實、王業立，1990，〈現在的選舉要怎麼拼才會贏〉，《中國論壇》，29(8): 44-49。
- 王業立，1989，〈從集體選擇理論探討我國立委選舉制度〉，《政治學報》，17: 55-85。
- ，2008，《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
- 王業立、彭怡菲，2004，〈分裂投票：一個制度面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8(1): 3-45。
- 王鼎銘，2003，〈策略投票及其影響之檢測：二〇〇一年縣市長及立委選舉結果的探討〉，《東吳政治學報》，16: 95-123。
- 王鼎銘、郭銘峰、黃紀，2008，〈選制轉變過程下杜佛傑心理效應之檢視：從日本眾議院選制變革的經驗來觀察〉，《問題與研究》，47(3): 1-28。
- 中央選舉委員會，2009，中選會選舉資料庫網站：<http://210.69.23.140/cec/cechead.asp>。檢索日期：2009年3月3日。
- 朱雲漢，2008，《2005年至2008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II)：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計畫編號：NSC 96-2420-H-002-25，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吳明上，2003，〈日本眾議院議員選舉制度改革之探討：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問題與研究》，42(2): 79-94。
- 吳東野，1996，〈「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方法之探討：德國、日本、俄羅斯選舉之實例比較〉，《選舉研究》，3(1): 69-102。
- 吳重禮，2008，〈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革的省思：匡正弊端或是治絲益棼〉，載於《如何評估選制變遷：方法論的探討》，黃紀、游清鑫主編，台北：五南。
- 林繼文，1997，〈制度選擇如何可能：論日本之選舉制度改革〉，《台灣政治學刊》，2: 63-106。
- ，1999，〈單一選區兩票制與選舉制度改革〉，《新世紀智庫論壇》，6: 69-79。
- ，2008，〈以輸為贏：小黨在日本單一選區兩票制下的參選策略〉，《選舉研究》，15(2): 37-66。
- 許介麟、楊鈞池，2006，《日本政治制度》，台北：三民。
- 張世賢，1995，〈日本眾議院議員選舉區制改革之研究〉，《中國行政評論》，4(3): 1-42。
- 盛治仁，2006，〈單一選區兩票制對未來台灣政黨政治發展之可能影響探討〉，《台灣民主季刊》，3(2): 63-86。

- 陳陸輝、周應龍，2008，〈如何評估單一選區兩票制下候選人票與政黨票之間的連動關係〉，載於《如何評估選制變遷：方法論的探討》，黃紀、游清鑫主編，台北：五南。
- 游清鑫，1994，〈選區規劃與選舉競爭〉，《選舉研究》，1(1): 75-89。
- ，1996，〈選區劃分：規範面的探討〉，《國家政策雙週刊》，141: 5-7。
- 黃秀端，2001，〈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策略投票〉，《東吳政治學報》，13: 37-75。
- 黃紀，2001，〈一致與分裂投票：方法論之探討〉，《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13(5): 541-574。
- ，2005，〈投票穩定與變遷之分析方法：定群類別資料之馬可夫鍊模型〉，《選舉研究》，12(1): 1-37。
- ，2008a，〈緒論：選舉制度的脈絡與效應〉，載於《如何評估選制變遷：方法論的探討》，黃紀、游清鑫主編，台北：五南。
- ，2008b，〈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下選民之投票抉擇：分析方法之探討〉，載於《如何評估選制變遷：方法論的探討》，黃紀、游清鑫主編，台北：五南。
- 黃紀、王鼎銘、郭銘峰，2005，〈日本衆議院 1993 及 1996 年選舉——自民黨之選票流動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4): 853-883。
- ，2008，〈「混合選制」下選民之一致與分裂投票：1996 年日本衆議員選舉自民黨選票之分析〉，《選舉研究》，15(2): 1-36。
- 楊鈞池，2001，〈後冷戰時期日本聯合政府之研究〉，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 蔡佳泓，2008，〈反貪倒扁運動的地域支持度〉，《政治學報》，45: 67-93。
- 蔡學儀，2003，《解析單一選區兩票制》，台北：五南。
- 謝復生，1992，《政黨比例代表制》，台北：理論與政策雜誌社。

## II. 外文部分

- 小林良彰，1994，《選挙制度：民主主義再生のために》，東京：丸善株式會社。
- 大竹邦實，1996，《実務と研修のためのわかりやすい公職選挙法》，東京：ぎょうせい株式會社。
- 日本総務省自治行政局選挙部管理課，2009，日本総務省自治行政局選挙資料網：  
[http://www.soumu.go.jp/senkyo/senkyo\\_s/data/index.html#chapter2](http://www.soumu.go.jp/senkyo/senkyo_s/data/index.html#chapter2)。檢索日期：2009 年 3 月 3 日。
- 河野武司，2007，〈日本の衆議院における選挙制度の改革を可能とした諸要因について〉，東亞混合式選舉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5 月 22 日，台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宮川隆義，1996，《小選挙区比例代表並立制の魔術》，東京：政治広報センター。
- 佐藤誠三郎，1997，〈新・一黨優位制の開幕〉，《中央公論》，4: 170-183。
- 村松岐夫、伊藤光利、辻中豊，2001，《日本の政治》，東京：有斐閣。
- 蒲島郁夫等，1998，《JES II コードブック——変動する日本人の選挙行動》，東京：木鐸社。
- Bawns, Kathleen. 1993. "The Logic of Institutional Preferences: German Electoral Law as a Social Choice Outcom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4): 965-989.
- Burden, Barry C., and David C. Kimball. 1998.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icket Split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3): 533-544.
- Cox, Gary W. 1990.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Incentives in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4(4): 903-935.
- , 1994. "Strategic Voting Equilibria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3): 608-621.
- ,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x, Gary W., and F. Rosenbluth. 1993. "The Electoral Fortunes of Legislative Factions in Jap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577-589.
- Cox, Gary W., and Michael F. Thies. 1998. "The Cost of Intraparty Competition: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nd Money Politics in Japa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1(3): 267-291.
- Cox, Karen E., and Leonard J. Schoppa. 2002. "Interaction Effects in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ermany, Japan, and Ital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9): 1027-1053.
- Donovan, Mark. 1995.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Ital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1): 47-64.
- Duverger, Maurice.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 , 1986. "Duverger's Law: Forty Years Later." In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eds.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Farrell, David M. 2001. *Elector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 Ferrara, Federico, and Erik S. Herron. 2005. "Going It Alone? Strategic Entry under Mixed Electoral Rul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1): 391-413.

- Fiorina, Morris P. 1996. *Divided Government*.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Flanagan, Scott C., and Michael D. McDonald. 1979.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Cross-National Concept: A Comparison of American and Japanese Identifier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 Galbraith, John W., and Nicol C. Rae. 1989. "A Test of the Importance of Tactical Voting: Great Britain, 1987."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1): 126-136.
- Gallagher, Michael. 1998.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Electoral System Change in Japan and New Zealand, 1996." *Party Politics* 4(2): 203-228.
- Gschwend, Thomas. 2007. "Ticket-Splitting and Strategic Voting under Mixed Electoral Rules: Evidence from German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6(1): 1-23.
- Gschwend, Thomas, Ron Johnston, and Charles Pattie. 2003. "Split-Ticket Patterns in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Election Systems: Estimates and Analyses of Their Spatial Variation at the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1998."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1): 109-127.
- Herron, Erik S., and Misa Nishikawa. 2001. "Contamination Effect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in Mixed-Superposition Electoral Systems." *Electoral Studies* 21(1): 63-86.
- Hizen, Yoichi. 2007. "The Effect of Dual Candidacy on Voting Decision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3): 289-366.
- Huang, Chi, Lu-huei Chen, and Ying-lung Chou. 2008. "Taiwan's New Mixed Electoral System and Its Effects on 2008 Legislative Election." Presented at the 2007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Electoral Studies, Tokyo, Japan.
- Karp, Jeffrey A. et al. 2002. "Strategic Voting, Party Activity, and Candidate Effects: Test Explanations for Split Voting in New Zealand's New Mixed System." *Electoral Studies* 21(1): 1-22.
- Katz, Richard. 1996.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ty Politics in Italy." *Party Politics* 2(1): 31-54.
- Kohno, Masaru. 1997. "Voter Turnout and Strategic Ticket-Splitting under Japan's New Electoral Rules." *Asian Survey* 37(5): 429-440.
- Laakso, Markku, and Rein Taagepera. 1979.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1): 3-27.
- Lancaster, T.D., and W.D. Patterson. 1990. "Comparative Pork Barrel Politics: Perceptions from the West German Bundestag."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2: 458-477.
- Leithner, Christain. 1997. "Of Time and Partisan Stability Revisited: Australia and New

- Zealand 1905-90.”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4): 1104-1127.
- Leys, Colin. 1959. “Models, Theories and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al Studies* 7: 127-146.
- Lijphart, Arend. 1984.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4.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ssicotte, L., and A. Blais. 1999. “Mixed Electoral System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 *Electoral Studies* 18(3): 341-366.
- Mckean, Margaret, and Ethan Scheiner. 2000. “Japan’s New Electoral System: La plus ca Change...” *Electoral Studies* 19(4): 447-477.
- Moser, Robert G. 1997. “The Impact of Parliamentary Electoral Systems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3: 284-302.
- , 2001. *Unexpected Outcomes: Electoral Systems, Political Parties and Representation in Russia*.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 Moser, Robert G., and Ethan Scheiner. 2004. “Mixed Electoral Systems and Electoral System Effects: Controlled Comparison and Cross-National Analysis.” *Electoral Studies* 23(4): 575-599.
- Norris, Pippa. 2004. *Electoral Engineering: Voting Rul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kanen, Robert, Benjamin Nyblade, and Ellis S. Krauss. 2006. “Electoral Incentives in Mixed-Member Systems: Party, Posts, and Zombie Politicians in Jap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2): 183-193.
- Rae, Douglas W. 197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eed, Steven R. 1999. “Strategic Voting in the 1996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2(2): 257-270.
- , 2005. “Japan: Haltingly towards a Two-Party System.” In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System*, eds. Michael Gallagher, and Paul Mitche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7. “Duverger’s Law is Working in Japan.” *Japanese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2: 96-106.
- Riker, William H. 1986. “The Duverger’s Law Revisited.” In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 Consequences*, eds.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Sakamoto, Takayuki. 1999. "Explaining Electoral Reform: Japan versus Italy and New Zealand." *Party Politics* 5(4): 419-438.
- Sartori, Giovanni. 1968.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Engineering." In *Public Policy*, eds. John Montgomery, and Albert Hirsch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oen, Harald. 1999. "Split-Ticket Voting in German Federal Elections, 1953-90: An Example of Sophisticated Balloting?" *Electoral Studies* 18(4): 473-496.
- Shively, W. Phillips. 1982. "The Electoral Impact of Party Loyalist and the Floating Vote: A New Measure and a New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litics* 44(3): 679-691.
- Shugart, Matthew S.,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2001.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ratmann, Thomas, and Martin Baur. 2002. "Plurality Rul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German Bundestag: How Incentives to Pork-Barrel Differ Across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3): 506-514.
- Taagepera, Rein, and Matthew S. Shugart. 1989.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hames, F. 2001. "Legislative Voting Behavior in the Russian Duma: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Mandate." *Europe-Asia Studies* 53: 869-884.
- Vowles, Jack. 1995.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1): 95-115.
- Wattenberg, Martin P. 1990.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1. *The Rise of Candidate-Centered Politic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f the 198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Gerald C. 1989. "Level-of-Analysis Effects on Explanations of Voting: The Case of the 1982 US Senate Elec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381-398.

# **Voting Behavior under Mixed Electoral System: A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during the Electoral Transition**

Ding-ming Wang<sup>\*</sup> · Ming-feng Kuo<sup>\*\*</sup>

## **Abstract**

Mixed or Hybrid electoral system, a combination of single-member district with plurality(SMD) an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PR), has drawn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past few years. Recen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its characters and classifications, its impact on the diversifie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onnection with strategic voting behavior,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campaign strategy and party competitio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new party system. Based on the survey conducted by Japanese Election Study(JES) and Taiwanese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TEDS), we compare the dynamic voting behavior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since both of them follow the same routine of electoral transformation from SNTV to Mixed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ere do have some difference, especially the ticket-splitting of the two ballots and the voting stability during system transi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From the cross sectional data analysis, we find KMT and DPP received more consistent support in two separate ballots, comparing with the major parties in Japan. As for the panel data results, the convergence to major parties is confirmed in both countries while the trend is more obvious in Taiwan once again. In short, we find the small parties in Taiwan have relative little room for competition, comparing with those in Japan,

---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up>\*\*</sup>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under new Mixed system. The formulation of two party system is quite noticeable in Taiwan.

Keywords: Mixed system, Japan House Election, Taiwan Legislative Election, strait-and split-ticket voting, voting stability and change